

第四帝国的崛起

〔美〕埃德温·哈特里奇著



K518.5/1

第四帝国的崛起

〔美〕埃德温·哈特里奇 著

范益世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42403



世界知识出版社

842403

Edwin Hartrich

THE FOURTH AND RICHEST REICH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1980

据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0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孙 政

第四帝国的崛起

〔美〕埃德温·哈特里奇著

范益世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10.75 字数：270,000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500

书号：3003·1630 定价：1.15元

目 录

前 言	1
序 言 “经济恢复压倒一切!”	4

第一部 盟国占领

第 一 章 最黑暗的时刻	29
第 二 章 “我们是作为征服者 来到德国的”	48
第 三 章 德国的非德意志化	60
第一节 德国的非军事化	61
第二节 德国的非纳粹化	69
第三节 德国的非工业化	82
第四节 德国的民主化	100

第二部 最富有的第四帝国

第 四 章 缔造者	111
第 五 章 从双占区到波恩	125
第 六 章 “捕鸟猎犬行动计划”	137
第 七 章 教授的大赌博	146
第 八 章 不在地主阿登纳	165
第 九 章 严格的制度，丰硕的成果	178
第 十 章 劳工吸取了过去的教训	194
第十一章 走回头路	213
第十二章 创造经济奇迹的人	231

第十三章 权力宝座	249
第十四章 联合执政	268
第十五章 一个“经济政治”世界大国的崛起	282
跋	307
注 释	317

前 言

我曾目睹当代德国各种不同的面貌。这个曾经主宰现代欧洲历史的民族，从不停歇、精力充沛，有时甚至表现反常，它那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吸引着我，最后促使我写出了这本书。

1932—33年秋冬，就在希特勒接管德意志共和国以及后来持续了仅仅十二年的所谓“千年帝国”开始的前夕，我作为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在德国访问，亲眼看到了魏玛共和国后期的混乱状况。当时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在大萧条的沉重压力下，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纳粹的冲锋队员同共产党的红色阵线痞子们为了争夺对汉堡大海港的政治控制权在街上大打出手。我第一次到德国与德国人民接触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我对交战中的德国的第二次印象也带有暴力的色彩。当时我是一名美国记者，由于德国伞兵营自天而降，突然袭击了荷兰首都海牙，我被困在荷兰的一片郁金香田野里。此事发生在1940年5月10日的清晨，是希特勒对低地国家无端发动闪电战的开始阶段。

希特勒用五天时间征服了荷兰以后，我来到柏林。那年夏天我一直呆在柏林。纳粹军队把纳粹党旗从大西洋海岸插到了波兰东部的布格河畔。我住在阿德隆饭店的一个房间里，从那里可以看到菩提树林荫大道上欢呼的人群，我看到了第三帝国在柏林举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欢庆胜利的阅兵。德国军队上一次通过勃兰登堡门是在1871年，他们从普法战争中凯旋归来。欢乐的1940年7月18日过去之后，形势开始对纳粹德国不利，但是变化不大，以致战争又激烈地持续了四年。

后来我亲眼看到了战斗中的德国。这次我是美国陆军的一名

士兵。美军第四十四步兵师对德军党卫队第十七装甲步兵师连续进行了一百四十四天的战斗，我对德国士兵的骁勇善战产生了既钦佩又畏惧的心理。但是一过了莱茵河，战斗就逐渐减弱了。

以后我再看到的是投降后的德国，这时的德国和我所记得的1940年的情况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当我们师行军经过春意盎然、山明水秀的斯瓦比亚和巴伐利亚时，城镇和乡村的每幢房屋和商店都悬挂着白旗表示投降。对他们来说，战争终于结束了。

然后是战胜者同盟国部队对德国的军事占领和统治，战败国德国百孔千疮，匍匐在盟国的脚下。我作为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又回到了德国。与其他观察员一起，我们把业务上的注意力集中于盟国军管政府的计划和行动上，很少注意那些忧患余生的德国人。在我们眼里，他们在战后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地位，只不过是失去了一些几乎所有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三等或四等国家的公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日子里，德国是国际社会中的贱民。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使受害者蒙受了伤亡和损失，战败了的敌国必须为此受到惩罚，作为它继续生存的代价，它必须接受“改造”，还得大大降低生活水平。同盟国对战败国德国的计划是苛刻而严厉的。用伦敦《经济学家》的话说，战后的头三年，德国“经济一团糟”。这段时期大概是德国人民自十七世纪“三十年战争”以来的最低点。

1948年6月币制改革以后，德国迅速而普遍地恢复和重建起来，使我们这些自枪声停止以来一直住在德国的人都深感意外。我们低估了德国人的恢复能力和他们为了生存而在昔日生活的废墟上重建被毁灭了的家园的能力。时间、环境和人物的有利巧合，加上意想不到的冷战的到来，使六千万幸存的德国人能够从失败和破坏的深渊中爬出来，在短短的一代人期间，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战后欧洲的经济超级大国。

我经历了这一发展的全过程，从开始到以后的各个阶段，直

至西德成为欧洲各国中最强盛和最有活力的大国——它享有充分的主权和政治上的独立，并在军事上与美国结盟。西德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它在经济上再次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机器车间”。

今天，德国人以充沛的精力、雄心和聪明才智终于赢得了“生存空间”，这是侵略成性的第二和第三帝国想得而未能得到的。今天西德人在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上为他们的现代商品和服务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他们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贸易大国，其富裕程度超过了我们这些了解二十世纪其他时期德国情况的人们的想象和预料。

我起初是一名驻德国的美国记者，后来是许多德国企业，包括埃森的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弗里德里希·弗利克股份公司和威利·H·施利克尔（“经济奇迹”的创造者）的企业顾问，所以我有幸多少参加了战后新德国的兴建。本书将说明新德国的重建过程。

埃德温·哈特里奇

1980年2月于伊利诺斯州

序 言

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建筑在血和铁之上，还不如说是建筑在煤和铁之上。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今日之经济力量取代了德皇凯泽时期的步兵师团。

——弗兰兹·约瑟夫·施特劳斯财政部长

(1966—1969)

“经济恢复压倒一切！”

1948年7月的一天上午，I·G·法本托拉斯原董事长的办公室里，在一张宽大的红木书桌边，面对面坐着两个人。奇怪的是，这两个人都是外来者。这间宽敞的经理办公室的前主人卡尔·克劳赫，是德国这家化学大托拉斯的最后一任总经理，当时被判为纳粹战犯，关在兰柏格监狱里。他的座椅和办公室现已被美国驻德国总督、美国占领区军事长官卢修斯·克莱将军所占。座落在法兰克福北郊宏伟的I·G·法本大厦已被征用，成为美国驻欧洲武装部队的总部。它在军界通常被称为“欧洲的五角大楼”。

在克劳赫先生这间陈设豪华而敞亮的办公室里谈话的这两个人截然不同。克莱将军身材瘦削，显得干练而专断，说话简明扼要。他笔直地坐在皮靠椅上，不时地在一本发黄的拍纸簿上记一点笔记，还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彻斯特菲尔德牌香烟。他是一位标

准的美军高级参谋。

将军对面坐着一位粉红肤色、娃娃脸的金发德国人，他抽着一支带纸嘴的雪茄。他宽松的衣服满是皱褶，歪系着领带，但他所关心的事比仪表重要得多。他就是正在形成的西德国家的雏形政府——美英共同占领区经济委员会主任路德维希·艾哈德教授。他用雪茄打着手势，用柔和的弗朗科尼亚家乡口音认真地讲着话。

克莱将军把这位美英共同占领区管理委员会的高级德国官员艾哈德教授召来，要他对他擅自采取的一项行动作出说明。艾哈德教授刚刚取消了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配给制度，并废除了对工资和物价的所有控制措施。实际上，他是要使那项支配着西德城镇的盛行的黑市供求法则合法化。当冷战仍不断威胁着西德的政治生存的时候，这一行动似乎损害了西德的整个经济。

克莱将军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问题。他对坐在对面的这位德国官员说：“艾哈德先生，我的顾问们对我说，你采取的行动是个严重的错误。你有什么看法？”

德国人立即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将军先生，不要理睬他们。我自己的顾问也是这样对我说的。”

这次交谈之后，艾哈德教授开始着力地兜售为振兴战败、破产的西德而制订的经济计划。他把它叫做Soziale Marktwirtschaft，意即“适应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换句话说，是“有良心的资本主义”。在这次会晤中，这位巴伐利亚教授的论点赢得了西点军官学校工程师的赞同；当他离开时，这位美国军事长官批准了他突然终止配给制和控制工资、物价的做法。

这次克莱—艾哈德的会晤无疑是战后德国历史上最关键的事件。它确定了不久就要在欧洲舞台上出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性质和形式。二十五年以后，为纪念这一开创历史的会见，全国性的日报《世界报》在社论中写道：

1948年初夏在法兰克福的这次戏剧性会谈，标志着这个国家自由市场经济的诞生，因此，也就是被形容为 *Wirtschaftswunder*——“经济奇迹”的开始。

从此以后，西德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跌进的深渊中爬了出来。艾哈德教授面对着普遍的怀疑和反对，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他的经济哲学移植到正在萌芽成长的西德，这在历史上似乎是一次偶然事件；这一杂交种籽终于生根、开花、结果——结出了无可比拟的真正的丰硕之果。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适应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将幼年的西德共和国改造成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上第三号经济强国，成为拥有几十亿黄金和美元储备的最富有的国家。^①艾哈德教授的“有良心的资本主义”这个方案意味着要从国民收入中让广大群众得到比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得到的还要多的好处。事实证明，在十九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所有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中，它最能创造财富和现代技术，并提供从襁褓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全盛时期”，它是二十世纪最成功的业绩。

1961年，《幸福》杂志在形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这个已有十几年历史的主权国家时，称它是“经济上羽毛未丰的国家”。直到1975年《纽约时报》还在重复过去的比喻，说西德是“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这些享有国际声誉的报刊所描绘的这种形象给世界留下的印象是：这个比较年轻的新兴国家，犹如不为人注意的黄种人国家，是突然变成了经济巨人，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但这完全歪曲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西德并不是一个缺乏现代国家所具有的平衡性和其他特征的畸形国家，而是一个应运而生的独特的国家：它是二十世纪第一个现代化的经济政治国家，^②也是1948年7月法兰克福的克莱—艾哈德会晤的重要成果。

如果从现代欧洲历史的观点来看，战后的西德在它的具体结构和特点上看来有些畸形的话，那是因为它所依据的价值标准和目标与其他大陆国家不同。指导西德这个“经济政治”国家的基本原则是，衡量力量和对当今世界影响的真正标准是经济实力和财力资源，而不是军事力量。实际上，与多数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不同，西德首先考虑的是经济，而不是国内外的政治问题。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届总理（不管他是保守党还是社会民主党）的言论和行动一再肯定了这一不同寻常的政策路线。例如，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理在1975年2月接见瑞士《财政与经济》杂志记者时，曾简单明确地说：“若干年来，我们的经济政策同时也就是我们的外交政策。”

请注意这一明确表示的信念：波恩的对外经济政策不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础，而是外交政策本身。

由于这个“经济政治”的理论，西德发挥了它充当欧洲机器车间的能力，向世界各地市场大量倾销竞争力强的优质工业产品和技术。由于西德再次成为欧洲的头号工业国，它的经济实力和财力对促进和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所起的作用，比拥有轰炸机队或大量原子武器会更有效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风云变幻的数十年中，德国曾费尽移山心力，企图实现它统治欧洲大陆的野心。俾斯麦曾强力推行他的“铁血”外交政策；凯泽·威廉二世提出要争得“在太阳下的位置”；希特勒为夺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而发动了侵略战争。尤其在希特勒时代，威廉的理论受到具有诱惑力的“地缘政治”的深刻影响，这一理论规定了一条基本原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和特点。德国横跨中欧，它只有通过侵略，大量攫取土地，才能称霸欧洲大陆，保证其经济自给，也就是保证其工业生产所需的重要原料，以及作为燃料和能源的石油能自给自足。希特勒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即1941年对苏联的三路大规模入侵，目的就在于夺得俄国的产粮地带、高加

索的油田以及顿涅茨盆地的矿藏，以便完全由纳粹德国控制和开发。所以“地缘政治”决定了德国只有通过军事征服或政治策略使东西邻国俯首贴耳，才能维护自己的安全。

在短暂的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战后新兴的德国正沿着一条不同的路线前进，它发现有无限制的“生存空间”任其发展。它用数以百万计的大众牌汽车、机床、机车、重型工程设备、机器、发动机和其他出口商品在世界各国建立了商业桥头堡，这比希特勒用几百万军队对欧洲、俄国和非洲进行的失败了军事征服所建立的桥头堡更加稳固和持久。

今日之西德是远比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更大更复杂的工业发达的国家，它同时也解决了自给的问题：西德能够轻易而又持续地获得它赖以生存的原料和石油，因为它能生产和供应多种工业品、消费品和提供服务，而这些又是拥有原料和石油的国家发展经济所必需的。总之，德国商人证明了埃莫逊的格言是正确的：“假如你做的捕鼠器比别人好，全世界都会来登门订货。”

主要工业大国在与中东产油国的贸易中，只有西德一家一直保持顺差。尽管西德每天消耗的燃料和能源中百分之七十五是依靠波斯湾的石油，但它已经卸掉了压在双肩上的经济重担，因为它向石油输出国组织出口的产品所赚来的美元已超过了它从中东源源不断进口的石油所要支付的美元。

在目前情况下，西德之所以能够保持这一贸易顺差，是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和技术先进的工业生产能力，使它在欧洲市场上与欧洲对手的竞争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现在西德已成为世界第二号贸易大国，即将赶上头号贸易大国美国了。由于优越的经济能力和财力，它已经成为在欧洲大陆上处于支配地位——如果不是统治地位——的国家。显然，“经济政治”在战后为德国人民取得了成就，这是威廉二世的凯泽帝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时期的“地缘政治”所未能取得的。

败仗往往是革命的先导。凯泽·威廉二世的德国和俾斯麦的第二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了。1918年11月11日停战后接踵而来的是一团糟的革命，由此产生了短命的魏玛共和国。但是，历史沉痛地教训我们，革命不一定会导致一个国家所需要的长远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而没有改革很可能就是这个国家失败的首要原因。在魏玛共和国动荡的十五年中，政府被折腾得焦头烂额，不得不把时间和精力用于争取生存，对付起义、武装叛乱和其他来自右翼和左翼激进政治派别的威胁。

魏玛共和国屈服于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人的阴谋。希特勒掌了权，开始了所谓的“千年帝国”。不到六年，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延续了五年，以数千万人丧生、欧洲从大西洋到伏尔加河遭受破坏和洗劫而告终。

紧接着一次打输了的战争而来的是一场夭折的革命，夭折了的革命又反过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这次战争同样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却产生了进行重大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的良好基础。德国人伤亡数百万人，损失了不计其数的物质财富和个人的财产、房产，更不用说这个民族在精神上和社会特性上所受到的创伤了。他们已经付出、而且还要继续付出高昂的代价以洗刷希特勒时期的耻辱。不过他们在财富和资产上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已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重新教育和改革的好处中意外地得到了补偿。

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没有发生革命——除了胜利的盟国部队外，他们没有进行叛乱的对象，而盟国部队只要发现一点叛乱的苗头，就会立即把它扑灭——相反，它成了一个百孔千疮、四分五裂和毫无生气的国家。这种景象令人沮丧。在被毁坏了的城镇里幸存的德国人似乎百无聊赖，失去了一切正常的感情。冷漠代替了愤怒；听天由命代替了复仇的愿望。人民的精神犹如临风残烛，飘忽欲绝。这个国际大家庭中的贱民国家还有复兴和重建的希望吗？前途的确暗淡，征兆不祥。

第三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崩溃以后，幸存的德国人全都感到愕然，他们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会发生如此急剧和灾难性的变化。但是他们的确懂得——即使不是出自理智，他们也本能地懂得——用发动战争来为德国谋求生存，这种代价太高了。仅在相隔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德国就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这使他们痛切地认识到需要用新的标准和价值观念来看问题。“德意志高于一切”的神秘感随着遭受战争破坏的城镇瓦砾中飞扬的尘土而烟消云散；在拥挤的医院里，几十万伤残人员没有止痛药；身着黑服的妇女排着长队等待领取日益减少的配给品；防御严寒的取暖用煤匮乏；成千上万的人不得不栖身于拥挤不堪的房间和防空洞里，毫无私生活可言；人们失去了存款和养老金，所得到的只是因通货膨胀而不值钱的帝国马克；由于经济生活从缓慢走向停止，强劳力失去了工作和工资，最后，德国人不得不面对惨淡的前景，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继续保持低于标准水平的生活。这些就是大家都想用几小时的睡梦去逃避的丑恶现实。但是每天早晨他们还得照样醒来，再去应付同样的问题，面对同样的现实。这样的痛苦生活似乎是对一个被引入灾难性歧途的民族进行大规模重新教育和改造的唯一药方。

然而，当时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认识到，这正是一个孕育着即将诞生的新“经济政治”国家的时期。美国和英国军事长官不知不觉地起了助产士的作用。幼小的联邦共和国学会了走路和说话；并开始显露出变异的特征。在外国观察家看来，它经过了短暂的青春时期后，已成长为一个“经济巨人”，但另一方面却是个“政治矮子”。今天，用较长远的眼光来观察，我们看到一些出乎预料的事，新“经济政治”的西德已开始和它那动乱的条顿民族的过去，和它的传统、特性以及世界观彻底决裂了。

战后的西德把首都建在绿色的莱茵河畔旧大学城波恩。当我们评价它在战后的价值标准和确定优先次序的标准时，我们看到

它比以波茨坦和柏林为首都时的德国不知前进了多少光年。今天的德国人已抛弃了俾斯麦的“铁血”世界观，抛弃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为争取“生存空间”而炫耀武力的政策，他们主张发展一种较为朴实但却更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正是亚当·斯密二十世纪的门徒路德维希·艾哈德教授所鼓吹的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希特勒第三帝国巩固了它对欧洲的军事控制（除瑞士、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外），反纳粹抵抗运动就开始萌发，反抗恐怖的党卫队的残暴占领统治。这些地下派别的性质和目标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为破坏纳粹的占领，加速第三帝国在军事上的早日彻底垮台而不停地工作。

但是，有一个地下抵抗小组却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组织在德国，它的目标主要是经济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它是由为数不多的几个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组成的小团体，以弗赖堡大学的教员们为中心，弗赖堡大学位于德国西南角的符腾堡——一个很少具有普鲁士特点的地方。这个组织正在研究，一旦第三帝国被推翻、砸烂时，如何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以取代第三帝国的自给经济和国家社会主义。这一寓于第三帝国极权经济之中的资本主义组织，是由沃尔特·尤肯教授和威廉·勒普克教授领导的。^③他们两人把亚当·斯密的著作和思想介绍给当时的经济学家艾哈德教授。亚当·斯密的著作和思想与艾哈德的思想相结合，产生了所谓“适应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也就是后来在克莱将军的协助下艾哈德教授在处于萌芽状态的西德所推行的那种经济政策。

根据可靠的新闻报道，艾哈德教授和莱比锡市长卡尔·戈台勒有着密切的私人联系，戈台勒还是7月20日阴谋暗杀希特勒的主要组织者。^④应戈台勒的要求，艾哈德起草过一个关于消灭纳粹后的德国战后经济政策的建议书。艾哈德不知道盖世太保正在缉

捕戈台勒，他把建议书寄到了这位莱比锡市长的家里。一位纯朴的，或者说是好心的邮递员没有把这份可作为罪证的文件送到戈台勒的家里，而盖世太保正在那里守候着。相反，他在信上注明：“收信人迁走”，将信退给了艾哈德，这真是九死一生。

这一经济理论可以直接追溯到苏格兰柯卡尔德的亚当·斯密。1776年首版的亚当·斯密的历史性著作《国富论》为现代资本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后来他的学说对十九世纪德国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时德意志帝国开始从田园诗般的青年时代成长起来，到二十世纪初成为欧洲大陆的工业巨人。

到十九世纪中叶，卡尔·马克思在科隆出版他的《共产党宣言》，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德国的实业家和商人们正如饥似渴地阅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汲取书中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学说。他们甚至给这种经济制度起名叫亚当·斯密主义，普遍地把亚当·斯密的原则看作是发展经济和取得繁荣的唯一正确可行的方案。

在拿破仑滑铁卢之战失败以后，英国对德国思想上的影响是强大而广泛的。英国的一位重要外交史学家G·P·古奇报道说：“亚当·斯密的学说不断地渗入了德国”，其结果是：

德国从一个平庸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大国，如同一块粗劣的土布转瞬间变成五彩缤纷的细布一样令人感到惊异。它获得繁荣就象过去获得权力一样突如其来。十九世纪初，德国是个贫穷的国家，但到十九世纪末它已是一个富有的国家了，……财富迅速的积累使它能从事工业、商业和殖民活动，从而又加强了国家的力量，现代化国家主要是通过些活动变得强大而有威望。……使德国强大的不单是政治家和勇士，而且还有化学家、银行家、发明家、船舶主、钢铁大王和煤炭大王。^⑤（楷体是作者标的）